

论新时期以来中国自传中的忏悔意识

周凌枫

(常州大学 文法与艺术学院 江苏 常州 213164)

摘要:西方自传受基督教影响,具有深远的忏悔传统;而中国自传中的忏悔意识则比较薄弱。新时期以来,巴金的《随想录》、韦君宜的《思痛录》等自传作品表露了可贵的忏悔意识。但其忏悔往往显示为一种精神表态,缺乏具体入微的自我剖析。冯友兰、周一良等则在自传中回避自我忏悔,把个人过错归因于外在环境。新时期以来的中国自传需要针对个体在历史中的具体表现进行深入的自省和忏悔。

关键词:自传;忏悔意识;忏悔;个人

中图分类号: I207.99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0448(2012)01-0134-04

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西方语境中,忏悔意识最初都与宗教有关。西文中的“忏悔”(confession)一词含有承认的意思,是人对存在于自身的罪恶和过错的一种自我揭露和坦白。在现代汉语中,“忏悔”一词则来源于佛教,表示对他人发露自己的过错,以求得容忍宽恕之意。自传是对自己生平的一种回顾性叙述,一个人一生难免犯有过错,传主如何在叙述中对待过错,是不是具有自我忏悔意识,便成为自传写作与研究的一个关键问题。

一 自传与忏悔意识

基督教在西方流传后,西方自传与宗教忏悔结下了不解之缘。忏悔要求基督徒依照《圣经》确立的道德准则,检视日常生活中自身的言行,对忏悔的记录就成为一种自传的形式。西方自传受基督教影响,在古代晚期已具有深刻的忏悔意识,并使欧洲人在自我揭示方面发生了深刻变化^{[1](P531-532)}。历史上流传至今、以忏悔录名目出现的西方自传作品有1 000种以上,奥古斯丁、卢梭和托尔斯泰写作的《忏悔录》是其中最著名的3部。

中国自传受宗教忏悔的影响甚微,中国没有形成严格意义上的宗教制度,佛教的忏悔仪式仅适用于出家人,没有流传到世俗层面而对大众群体产生

实质影响。虽然儒家传统也讲究“自省”,但“自省”不同于“忏悔”,不是一种宗教道德的要求,也不具有精神的强制性。而且,“自省”主要是一种主体独立行为,只需在主体的思考中完成,无需记录下来,因而不能形成传诸后世的自省文字。此外,儒家信奉“性本善”,并不认同西方原罪的观念。既然罪过并非普遍发生,忏悔意识也不会成为普遍的诉求。

中国传记写作的具体环境也不利于忏悔意识的表露。在专制皇权统治下,古代传记被用作道德教诲的工具,传主被纳入道德的规范,隐恶扬善、文过饰非成为传记的通病。所谓“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传主都被塑造成没有瑕疵的道德圣人。为他人写传尚且如此,自传写作者更把自己认定为道德君子,不会冒天下之大不讳,把自身的过错和弱点暴露出来。因此,与受基督教影响的西方自传相比,东方人在自传中往往只谈自己好的方面,自我描述“与罪和痛悔无关”^{[1](P532)}。由于社会历史文化的作用,中国自传中的忏悔意识一直比较薄弱。

在“五四运动”时期个性解放思潮的催生下,中国自传写作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迎来了第一次高峰。受西方思想文化影响,尤其是基督教和忏悔自传的直接影响,中国现代文人和知识分子开始了自我反思与忏悔的精神自救,在自传中透露出某种自

收稿日期:2011-09-16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社会转型与自我意识的嬗变——新时期以来的中国自传研究(1978—2008)”(11YJC751129);常州大学科研启动基金项目“新时期以来自传中的自我意识与现代启蒙思潮”(ZMF1002099)。

作者简介:周凌枫(1973-),男,江苏溧阳人,副教授,文学博士,从事中西传记文学与传记理论研究。

我批判的忏悔色彩,特别是在传统禁忌的性心理、性活动方面,呈现出前所未有的自我暴露倾向。郁达夫以直白的方式袒露自身的劣迹与阴暗心理,其自我暴露的程度可与前辈卢梭比肩。这时期忏悔意识较明显的自传作品还有巴金的《生之忏悔》、徐志摩的《自剖文集》、欧阳予倩的《自我演戏以来》等。自我忏悔在二三十年代成为一时风潮,并促动了自传的繁盛。然而遗憾的是,真正的忏悔意识只发生在少数作者身上,而且并不彻底。经过短暂发展,“抗战”爆发后,中国自传中的忏悔意识复归于寂寥。

二 忏悔意识在新时期以来中国自传中的再度萌发

新时期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自传写作迎来了又一次发展高峰。在少数自传作品中,忏悔意识得到了再度萌发,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巴金的《随想录》。“文革”结束不久,巴金是第一位对那个非人化时期中的自身表现进行自我反思、剖析和忏悔的。其实,从“反右”到“文革”期间,巴金没有主动揭发和出卖他人,更没有亲自上阵批斗过别人,反而是自己受尽磨难。可是,为了知识分子的良知,为了受损伤的脆弱的人格,他必须回顾那段历史,直面内心深处的阴暗,把人性的弱点暴露在世人面前。

“在写作忏悔录时,作者袒露心灵或灵魂,试图揭示那些内在的、并可能是永恒的自我真相。”^{[2] (P6-7)} 巴金写作《随想录》,就是为了揭示自我。在代表作《激流三部曲》中,巴金鞭挞高觉新在压力下放弃自我意识的妥协性格,经历过“文革”的梦魇,他痛苦地发现自己正是早年鞭挞的对象。巴金无情地解剖自己:“我怎么会是那样的人?!我放弃了人的尊严和做人的权利,低头哈腰甘心受侮辱……我越想越后悔,越想越瞧不起自己。”^{[3] (P428)} 以“五四运动”时期一代知识分子具有的启蒙意识和批判精神,巴金早已看透了“文革”的荒谬。然而他却无力反抗,几千年文化传统遗下明哲保身的教训,教他在屈辱中忍受下去。正如他所坦承:“我不是服从‘道理’,我只是屈服于权势,在武力之下低头,靠说假话过日子。”^{[3] (P280)} 有学者评道:“《随想录》的忏悔意义,就在于作家谈了自己,谈了个人的恶行与个人的作用,从一个具体的个人身上去总结历史的教训。”^{[4] (P248)} 巴金在“文革”中也曾配合运动,说过假话,但他没有把责任推给外在因素,而是从内在主体揭示个人和社会文化的病因。

巴金在非常岁月中失去了人格尊严,因此内心

充满了负疚,他必须公开作出忏悔,才能得到心灵的平静。“这是一笔心灵上的欠债,我必须早日还清。它像一根皮鞭在抽打我的心。”^{[3] (P235)} 真诚使他无法逃避作家的责任,忏悔则使他赢回了知识分子失去的尊严。“从‘自我’塑造的目的上说,则是通过‘忏悔’,以重建英雄意识,重新确立他早已认定的那种对社会应该负起的责任,把一度迷失的东西追回。”^{[5] (P125)} 正是出于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感,巴金在80岁高龄时,依然拿起笔对自己进行鞭挞,也对社会进行鞭挞。

除了《随想录》,在新时期以来的自传中,韦君宜的《思痛录》是另一部具有明显忏悔意识的作品。作者向世人告白:“在左的思想的影响下,我既是受害者,也成了害人者。这是我尤其追悔莫及的。开始我自我安慰,以为人总是有缺点的。我不能因某些缺点而放弃我美好的理想和信仰。但是许多事情的不公平,本人的遭遇,亲眼见到的不合理,实在让人无法坦然。”^{[6] (P5)} 韦君宜展现了可贵的勇气,述说亲身经历过历次政治运动中的“不合理”现象,从延安抢救运动,到“三反五反”、“胡风案”、“反右”、“大跃进”、“反右倾”,一直到“文革”,她对过去许多事物产生了怀疑,并从怀疑中对当时的自我表现进行反思和忏悔。作为一名知识分子,她有责任把自己亲历的事实和由此产生的思考向世人坦白。

韦君宜对“文革”期间自己在出版社担任编辑的经历特别刻骨铭心,她为此反思道:“我想了很多很多该忏悔的事情……编造这些谎话,诬陷我的同学、朋友和同志,以帮助作者胡说八道作为我的‘任务’。我清夜扪心,能不惭愧、不忏悔吗?”^{[7] (P169)} 有评论者认为,韦君宜在《思痛录》中能够坦诚地面对历史,坦诚地解剖自我,是因为“她不仅了解到那个体制的内幕,也痛切地感到在革命秩序中无法保持做人的起码操守”^{[8] (P40)}。韦君宜认识到了炮制“革命文学”的荒谬性,但终究没有勇气与之抗争,不过她毕竟在事后作出了自我忏悔,这是许多同时代作家未能做到的。

此外,在新时期以来的自传作品中,徐友渔的《蓦然回首》、陈凯歌的《少年凯歌》等在回忆“文革”经历时也表露了可贵的忏悔意识。

三 忏悔意识的普遍缺失

纵观新时期以来的自传,虽然巴金、韦君宜作出了一定程度的自我忏悔,但多数自传不具有忏悔意识,即使传主曾有过公开的不光彩经历。如一些知

名学者、作家曾于“文革”期间参加过“四人帮”组织的写作组,在历史上留下过污点;但在自传写作中,他们没有对过去的迷误进行忏悔,没有对非常岁月中的自我表现进行认真反思。阻碍他们忏悔的,有社会政治方面的原因,也有文化传统的惰性因素。

冯友兰于“文革”后期加入过“梁效”组织(为“文革”后期江青组织的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两校大批判组的集体笔名,是“两校”的谐音)。自传《三松堂自序》为其晚年失节进行了一定的自我辩护或解释。在当年“批孔”运动中,冯友兰背弃了一生尊奉的儒学,加入批判孔子的队伍,写了两篇批孔的发言稿发表,且大受欢迎。他对此解释道“我何必一定要站在群众的对立面呢。要相信党,相信群众嘛,我和群众一同批孔批尊孔,这不就没有问题了吗!”^{[9] [P187]}冯友兰从群众路线上为自己当初的行为寻找理由,而未反省行动背后暴露出的自身人格弱点。他另解释道“我当时自以为是跟着毛主席、党中央走的,鼓励我的那些群众也是这样想的,至少也是这样说的。可是我当时也确有哗众取宠之心。有了这种思想,我之所以走了一段极左路线,也就是自己犯了错误,不能说全是上当受骗了。”^{[9] [P196]}他承认自己犯了错误,但仅仅点到为止,并不继续深究自己的心理,进而从个人利害关系上对自己进行剖析。从总体而言,对于个人的历史错误,他在自传中只有辩解,而缺乏可贵的忏悔意识。正如有国外学者评价中国自传文学“不做自我批判,自我否定,较之自我省察,更注重自我辩明。”^{[10] [P213]}

以自我辩解代替自我忏悔成了多数人对待历史的态度:他们不是审视自身行为是否有违原则,而是强调行为的外力因素,尤其是群众或组织的作用。因此,在“文革”那样声威巨大的群众运动中,国人轻易抛弃了个人道德良知的重负。在群众这面挡箭牌下,种种有违人的价值和尊严的行为不再受到“羞耻心”的谴责,并且在事后轻易把责任推给当时的外在环境,而不反思和忏悔自身内心的罪责。

周一良与冯友兰同在“梁效”写作组充任顾问,并为配合儒法斗争写过多篇文章。在自传《毕竟是书生》中,周一良回忆道“当时天真地认为批林批孔使自己几十年前古典文献的训练,今天居然服务于革命路线,总算派了用场,不免欣然自得。”^{[11] [P73-74]}周一良应命投靠“梁效”,并不能完全由他个人负责。但在新时期写作自传时,他仍不能以一名历史学家的洞见,给“梁效”作出科学的、理性的评估;更没有以一名知识分子的良知,对自己的

行为作出反思和忏悔。正如有学者评论道“周一良先生对自己在梁效两年的历史只是以‘毕竟是书生’来交代,就显得过于轻松,因而少有深刻的自省,多有委屈的自辩。”^{[12] [P183]}

当代文化名人余秋雨曾在“文革”期间加入张春桥、姚文元控制下的上海写作组,以“石一歌”(为上海写作组的集体笔名,是“11个人”的谐音)的名义发表过一批批判文章。自余杰发表《余秋雨,你为什么不忏悔?》一文,要求余秋雨忏悔的争论一直就未平息过。但在自传《借我一生》中,余秋雨对自己在“文革”中的作为语焉不详。对于“石一歌”事件,他作了一个“最终了结性”声明“只要能出示我用‘石一歌’名义写过任何一篇、一节、一段、一行、一句有他们指控内容的文字,我立即支付自己全年的薪金,作为酬劳。同时,把揭露出来的文字向全国媒体公开。”^{[13] [P556]}丁东在论“文革”写作组现象时说,至今只有冯友兰和周一良对写作组经历作了比较坦率的回忆,而余秋雨则讳莫如深,“巧妙地避开了写作组的经历”^{[14] [P169]}。余秋雨对某些历史事实一直在回避,更不能对历史错误进行自我忏悔。

另外,舒芜、浩然等作家在历史上或多或少有过遭后人质疑的经历,他们的自传作品《回归五四后序》及《我的人生》也没有对过去的经历表示忏悔。

四 忏悔意识的历史要求

“文革”梦魇过后,对于刚刚过去的丧失人性的时代,理应有众多当事人站出来,为当年的自我表现作出忏悔。然而在新时期以来的自传中,忏悔意识依然十分欠缺。若论自我忏悔的程度,尚没有自传作品超过《随想录》。《随想录》被认为达到了当代忏悔的最高境界“在中国现代思想史上,《随想录》超越了文学的价值,更是一部现代中国社会的《忏悔录》,这是文革之后,替我们整个民族所作的忏悔。”^{[15] [P78]}然而,巴金的忏悔常常显示为一种政治立场式的思想表态,却很少深入具体事件和行为的细节中,去挖掘自身的道德灵魂。韦君宜的忏悔同样如此。他们的忏悔主要属于政治道德层面的自我批判,忏悔的依据主要不是用以洗清罪恶的道德准则,而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道德或所谓“操守”。巴金自己承认,他作出的自我解剖和忏悔只是轻轻碰了一下伤口,远远没有触及灵魂^{[3] [P274]}。

更多自传作者对个人错误仅限于从外在环境进行解释,而缺乏内在的关于道德、人性的反思。他们抗拒忏悔所依托的是政治权力、群众运动等外在力

量,而非传主本身拥有的道德资源。而离开个人自身的道德责任,便不会产生真正的忏悔意识。对于参与“文革”“御用”写作组,冯友兰解释自己是跟着毛泽东走,跟着群众走的;周一良则强调是组织调动,而非自己想去的。“事实上,在中国文化里,并没有超越世间的救赎,唯有‘不脱离群众’才是唯一的拯救。”^{[16] (P175)} 把个人的过失说成是环境使然,主体因而心安理得地推卸了应负的责任。

在基督教传统影响下,忏悔在西方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的意识 and 行为,浸染了人们的思想和道德观念。“展示自己的创伤,是出于一种治救的目的,这种治疗的必经途径就是讲出真相。因为一切忏悔话语还有一种共同的目的:心理的松释和自我的解放。”^{[17] (P333)} 承认罪过和错误,说出内心的隐秘,可以带来精神的解放和道德重负的解除。通过忏悔,一个人重新变得像初生的亚当一样干净、清新,去迎接全新的未来。

自传为忏悔意识提供了表达的载体,在对过去经历的回忆和叙述中,一个人必然要面对自己曾经犯下的过错。“人非圣贤,孰能无过”,问题的关键在于事后如何看待错误。马克思说过“人类要洗清自己的罪过,就只有说出这些罪过的真相。”^{[18] (P418)} 历史铸成的错误虽已无可更改,但错误经过当事人的坦白和忏悔,可以沉淀为宝贵的历史经验,有助于降低类似错误在历史上再次发生的机会。对于过去那场极左路线下的历史灾难,我们不仅应从社会政治环境、传统文化习俗等外部因素进行反思,而且必须针对每一个体在历史中的具体表现进行深入的自省和忏悔。“不把个人摆进其中,对外部因素的思考便会缺乏深度,会演化为对一些命题的抽象探讨。”^{[5] (P94)} 随着我国社会文化的逐渐进步和开放,在新时期以来的自传中,将可能出现更

真诚、更深刻的忏悔意识。

参考文献:

- [1] Georg Misch. A History of Autobiography in Antiquity [M]. Dickes E W, trans. .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Ltd, 1950.
- [2] James Goodwin. Autobiography: The Self Made Text [M]. New York: Twayne Publishers, 1993.
- [3] 巴金. 随想录 [M]. 合订本.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05.
- [4] 陈思和. 人格的发展: 巴金传 [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2.
- [5] 洪子诚. 作家姿态与自我意识 [M]. 西安: 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1998.
- [6] 韦君宜. 思痛录·露沙的路 [M]. 北京: 文化艺术出版社, 2003.
- [7] 韦君宜. 思痛录 [M]. 北京: 十月文艺出版社, 1998.
- [8] 丁东. 谢泳. 思想操练 [M].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 2004.
- [9] 冯友兰. 三松堂自序 [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84.
- [10] 川合康三. 中国的自传文学 [M].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1999.
- [11] 周一良. 毕竟是书生 [M]. 北京: 十月文艺出版社, 1998.
- [12] 沙叶新. “书生”及“梁效”评议 [G]// 愚士. 余秋雨现象批判. 长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 1999.
- [13] 余秋雨. 借我一生 [M].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04.
- [14] 丁东. “写作组”初探 [G]// 愚士. 余秋雨现象批判. 长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 1999.
- [15] 秦裕. 忏悔与虔诚——论道德真诚 [M].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1994.
- [16] 孙隆基. 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 [M].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
- [17] 杨正润. 现代传记学 [M].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9.
- [1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1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2.

On Consciousness of Confession in Chinese Autobiographies since the New Period

ZHOU Ling - feng

(School of Humanities ,Law and Art ,Changzhou University ,Changzhou ,Jiangsu 213164 ,China)

Abstract: Influenced by Christian religion ,confession in western autobiographies has its long tradition. However ,in Chinese autobiographies ,confession is rarely seen. In autobiographies since the New Period ,Bajin's *Sui Xiang Lu* and Wei Junyi's *Si Tong Lu* expose valuable consciousness of confession. But without vivid self analysis ,their confession only appears as sort of moral gesture. Feng Youlan and Zhou Yiliang evaded confession in their autobiographies ,leaving their personal error to external reasons. In accordance with individual behavior in history ,it is necessary to display confession in autobiographies since the New Period.

Key words: autobiography; consciousness of confession; confession; individual (责任编辑 胡海金)